



儒的精神使命 周天民

(2006-12-27 9:35:38)

作者：周天民

之智去迫進，以為禮制之設置，正可防禁人之不仁，使人步向仁的感興。但無仁懷為根基的禮制，如何還能之為禮制？不過是鐘鼓玉帛而已，而其意理中心，亦將旁轉為「名器」。換言之，舍仁情育化的播植，而求秩序之重建，必于潛勢中，無形中肯定政治權力的形上先在性與制宰性，益為桎梏仁懷的育養。儒者創生文化生命，正在于「人心」「世際」雙方向溯源及本，引發真幾之重現和流行，其中無旁假轉借可言。

而荀子卻舍仁懷而著重「知」、「制」、「治」以求「盡制」，他逐漸轉移到文制規約的客觀精神，和「知解規距」的識知辨示的客觀性，一則他視人心意理，一如「道心惟微」不可持之以改造時代和重建秩序。二則他真正肯定制度流行的絕大勢用。第一點的原因，是他親仁懷意理為一被動性的源泉，必借助文制之力量以守恃之，而且仁懷意理多少亦被視之為不過是助成文制內化和穩固的主觀條件而已。第二點，荀子是第一個原始儒家思想者，充分理解到「禮制」流行態的，育化力量，客觀盡制成用以助化的勢動，于荀子思想得到細膩的分析和肯定。孔子「名正事成」的肯定只是一直觀通透的肯定。在荀子則由「心理」、「情識人格」、「社會價值」、「政治結構」系統的展開，以肯定構制之，「王制」、「君道」、「臣道」、「致仕」、「富國」、「強國」、「王霸」等篇將「禮制」、「治亂」的客觀交互關係充分呈明之。但失卻「主觀自覺」為之根基，失卻「意理遙攝」為之源流，盡制的理想只能由樸質民俗之供輸不自覺之價值感興力量中實踐，卻不能以之去改造一污世的時代。

法家繼承盡制的理想，將之安置于自然生命之情識動機結構上，而將仁懷意理的隱匿推至極點。貴族血親政治秩序，雖得以重建，但其性質卻已完全改變。由荀子引出韓非，并非偶然。正如天人斷裂之力量不斷的復反，不是偶然。其復反一如真幾隱微的召喚，是永恆的脈動。大化流行與意理匿現的時與「世」的曲折，原因亦在于此。

孔子繼述殷質周文之體制，重創一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將其不自覺的客觀精神和文制體現，歸攝于一健動自新，應天感通的自覺精神下，亦即為周文貫注一新的生命血流。孔子肯認，流行遍在的天道，自有其世際的呈現，客觀精神的育化成用必凝定為文制的結構。但孔子著重在，文制結構必統攝于價值意理之下，而價值意理的「權以執中」必統攝于天源真幾的遙攝靈現之下。而真幾之守恃和發用，卻是血肉生命之實踐和「死而後已」的事。而孔子卻正以其人格生命表現出此渾成不遺的血肉踐現，其智慧和人格是一圓通不測的覺照，隱現其上，深植根處，則是天道時現的流行。而孟荀以後，儒者之應時而待和致化成用，就動蕩于主觀自覺(孟子)和客觀制用(荀子)二極之間。

3. 歷史與健動

孔子所體現出之儒者形象中，其生命非只是靜態的人格理想與典型而已。「時」、「世」的深切體驗，代表著一由人格生命熔鑄而成的靈明，健動的歷史直覺——乃是動態而通透的智慧，與生命踐現互育互激，藉之與文化歷史的源流合而為一體。此圓通慧覺，為中國思想史開創一深遠博大的歷史意識的傳統。荀子的王制論，漢初的五德始終論，禪讓論，暴君放伐論，應命自新論，太史公的史學精神，以及後世邵子之運會觀等，皆是由此原始慧覺中流出。

儒者之歷史直覺生之于由人格生命以創現文化生命時，真幾靈現與歷史流行相遇相融的生命境界中。儒者固然有形上本體的透悟，有寂靜幽澈，清玄靈明之生命體驗，也有對天命流行，大化不息，淵默不測之超越徹悟的一面，更有戒慎自恃，播植教化，尊德崇道，重倫常身行的一面。但儒者之為儒者的特色，卻在于以仁懷剛健和歷史直覺匯合而成的生命參與上。儒者是在創現而再生文化生命的歷史性參與，內聖外王的上學下達必映現在歷史文化具體的境遇

上，凡形上體驗、歷史自覺、生命境界、身行德性、德化事功均環繞在「人文化成境遇的歷史性參與」上。

聖王賢相的治世，儒者有其積極。紂來盜跖的亂世中，亦有其積極。凡有生命處，即有育化致用的可能，即有儒者的積極在，而其生命指向于歷史的格局上重創文化生命。同時，儒者藉此以超越于個體生命之上，引發天源以自育育人，自渡渡人。頌誦先聖典要，傳習倫常德義，樹立文制儀則，若離卻一己生命之內在的超升，離卻奮進自覺與應天自新，離卻以歷史參與上及文化生命的精神，將無任何意義可言。儒者的生命再生和創造不但是一存在性的躍進和突破，更是個體生命閉限的突破。但其不是一氣魄承當或意興踴發的健奮，因儒者必渡入生生大化的歷史流行，方能見及育化大用活潑的源泉，不可能是一靜態的境界，必是一積健自運的生命流行。是而儒者的感通應現，不可能是一理境的冥同觀照，必藉血肉生命之自健自踐方能通外之。

由于這點特性，儒者之傳習，幾乎不能制度化和角色化以行之。儒者生命之難，此亦是其一。儒之傳衍，無法以傳典授服而成立，亦無法以傳知授藝而完成，因知藝典服非儒者生命性之所在。文化生命，歷史人格和天源真幾，何能以藝知服典的方式去傳衍？又何能以藝知服典的方式去表達？若不能明心見性，掌握一己這人格生命以復見天心真幾，外馳則是物象之調調刁刁，內視不過是「慮歎變熱，姚佚啟態」之情識心象，何以得見天心真幾？若不能以真幾之積健發用，升登個體生命之上，而停耽在理境寂趣的光景上，歷史之意理，文制變遷，不過是心識緣現的虛妄而已，何以得見歷史生命大流？（釋、道、禪在此均有所短。但知一己生命的超透，末見生命與生命之間之上的流行，此流行與心性之真幾，豈是二物？）

若不能將歷史生命的流變，貼切到意理真幾之健動和曲折處來看，徒見歷史之演化，而歷史生命亦被作自然生命來看，因而歷史意識變質為相對主義，進化論，定命論，循環論。在諸論之下，則是自然主義的變化觀，又何能就歷史生命真透文化生命，更而上達健動運行的天道淵默？凡此均不是理境觀照或識見轉變所能致成，因此也不能以禪坐默思，或哲學知識以傳授之。這是生命的創造，生命質的轉化後方能通達的言默智，慧覺照，境觀哲思可以輔助之，卻無以致成之。

莊子曾言：「口不能言，有存焉于其間。」「不能喻，不能受。」「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孟子也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儒者的衍傳，全賴生命精神的播植在感通化育中以促成別的生命之自覺創造。徒奉古人之糟魄為經傳典要，往往造成形式和教條，正足以扼殺生命之自覺創造。正足以堵截天源真幾的應現。是而儒者的衍傳在于育化的播植和生命自覺的創生再現上。也可以說，儒者生命的遞沿，是一不斷由死而復生的大歷程，是一個不斷以創造性應現和再生，以承受而踐現大化本源的過程。此過程的參與，亦是儒者歷史性特點之所在。將一己之有限生命，奉獻為歷史良知和天道展現的廟堂。儒者生命的傳衍，一如禪宗傳心的精神，不同者，禪宗在求與天地本源冥合大通，造就的不過是有限生命的完成，不如儒者由天道的積健之體驗，深悟歷史文化生命正是大化本源以廣施化育博載生命的流行態的呈現，而在歷史世際的運轉下去掌握一己生命的意義，和創發意理昭現的時態。

儒者生命之歷史直覺和歷史性，是儒者的根本特點之一。漢儒過之，宋儒不及之，明儒偏失之，至清儒，此精神幾乎喪失，儒者衍傳之難，由此可見。儒者有別于釋道傳統，即在于此特點，儒者不能成為宗教，原因亦在于此。而歷史性和其圓覺慧照并非只是識見和學說成己，而是承繼商周久遠智慧，予以創生再現的深沉體驗而來。同時亦本之于儒者對天道本源的體驗而來。釋道的本源，均是一空寂靈明，深幽靜極的境界，儒者同意這一層的修證，因透脫自然生命，復本觀照，天道果如是相。但這只是復本初現而已，若以仁懷積健人文生命通透之，道相焉只是一己生命的剛健奮進所能窮盡的？熊十力先生語：「只欲一身向虛靜中討生活，于不仁與沒奈何中，聊以自利而已。」所評極是。熊先生引述船山易內外傳之四義，正是儒者超透一身，融入歷史文化流行，而體證之道相，亦是儒者血肉生命和精神使命的核心所在：

1. 尊生而不溺寂
2. 彰有而不耽空
3. 健動而不頹廢
4. 率性無事絕欲

儒者之歷史性正是由此本源昭現的不容已而來。由此昭現，儒者必突出而為，歷史參與，引現育化的生命歷程。儒者

焚身以傳火，有徹照歷史文化展現的使命在，有自健自育以重創文化生命的使命在。這是儒者仁懷真幾上澈天道積健而化育的本源所致成的使命。倫常德行、明心見性、修齊治平、內聖外王，若無此使命感的通達本源，將失卻其一貫之生命血流。無此血流之潤養，倫常德行可淪為道學，心性體證可流為空玄，修齊治平可變為游說，內聖外王可成為說教。倫常德行可傳，心性體證可傳，修齊治平可傳，內聖外王可傳，唯儒者歷史性之血肉生命卻不可傳，而有賴于育化播植和生命覺醒，以致成歷史文化、通貫天地之精神使命的真誠體驗，使生命能自育自化以躍入「于穆不已」天命遙攝的召喚之中。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关闭窗口\]](#)